

# 从文化角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

陶文昭



《全球化进程中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研究》,赵学琳著,经济科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。

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,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方略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,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,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,应该相互视对方的发展为机遇而非挑战,相互把对方当作伙伴而非对手,让‘同舟共济’、团结协作、互利共赢成为时代主旋律。”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,文化差异、文明矛盾等问题仍然日益凸显。如何跨越文化鸿沟,增进跨文化认同,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共同课题,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解决的现实障碍。

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领域、重要内容、重要资源和重要方式。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、文化冲突加剧的时代,通过增强文化共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,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。从文化视角研究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是深化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视角和新兴领域。既是一个具有前沿性的角度,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,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。

专著《全球化进程中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研究》在深入研究共同体内涵与意义的基础上,深刻阐释文化在构建共同体内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实践功能,准确剖析共同体内建设中面临的文化问题与挑战。在这个基础上,该书充分阐发中国文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价值,科学总结共同体内建设中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原则、目标与取向,探索全面系统的文化战略,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整体性研究成果。

## 一、深入研究了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价值,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学的研究视角

文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,民心认同和民心相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心基础,文化是构建这一人心基础的“软环境”和“软条件”。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在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,它关系到不同文化背景的

人们能否建立起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,进而为全球合作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。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巩固,能够打破文化隔阂,减少文化误解,增进各国间的信任与理解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。

该书指出,文化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重要领域和重要内容,而且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条件和重要保障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保证和实践动力。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,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生根发芽,结成累累硕果,前提是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、发展的生态要素和生态环境,文化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,就像是空气和土壤对于植物一样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环境条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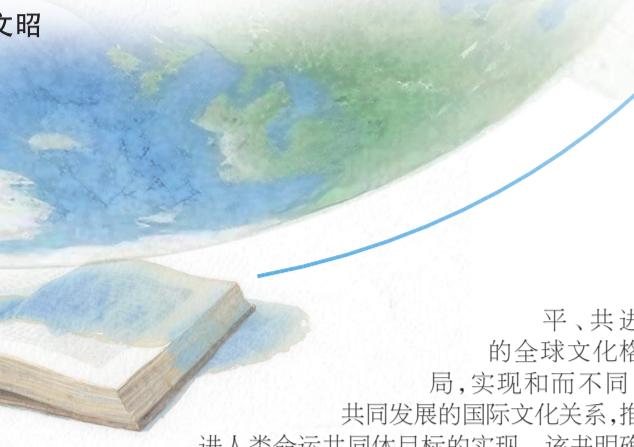
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,有利于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,有利于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文化治理体系与机制,有利于推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交流,有利于实现全球性文化问题的有效解决,有利于贡献全球文化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。这些机遇和作用,为我们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。

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、文化学、中共党史、国际政治等多学科知识,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创新趋向,明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立场与视角,扩展了学术研究空间和领域。该书深入研究了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联性,进一步探究了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学理层面的重要联系,提炼了文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,体现了充分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价值。

## 二、深入研究了国际文化秩序的中国话语权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动力与遵循

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需要从文化维度出发,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,打破文化壁垒,形成共同的文化认知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需要准确把握全球文化发展的前沿态势,针对具体问题,挑战及其发展方向,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科学理念。为此,要科学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立场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理念和精神滋养,从而为国际文化秩序提出科学的话语主张。

该书提出要增强我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,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能力与成效,积极建设平等、和



平、共进的全球文化格局,实现和而不同、共同发展的国际文化关系,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。该书明确了我国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文化主张,提出培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、增强文化多样性、推进文化对话与交流等重要话语,明确了我国对于国际文化秩序和文化关系的目标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路径,并非要削弱或消灭国家主权,不是要抹杀文化多样性,而是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,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,增强人类社会的共同性,寻求人类社会的共同点,构建文化共识。

书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态度是,让世界各国和更多的人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,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国家地位和国家间关系的主张,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环境,做到求同存异,在不同国家、民族和文化系统中形成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性认识。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是以平等对话、包容理解、求同存异为原则进行的文化战略条件。在这个基础上,提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条件,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供中国的文化智慧与文化方案。

该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出发,发挥我国文化理论和文化战略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属性,科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目标,全面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条件。在这个基础上,提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的科学理念,坚持历史性、针对性、科学性、建设性的科学导向与要求,不断完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体系,实现战略的协调性、有效性和前瞻性。

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,需要坚持全球视野和开放意识,明确问题意识,全面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全球文化冲突、博弈的状况。只有深入分析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问题与挑战,剖析西方文化和文化冲突理论及其战略的负面影响,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提供客观的现实依据,从而保证文化战略的适应性和科学性。

## 四、深入研究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战略的框架体系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与贡献

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,要正确处理国家主权与人类利益、文化主体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、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等文化关系。要依据全人类发展利益、各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共同取向,提高我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。该书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属性,深刻阐述了我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文化战略,形成了文化战略的系统结构与具体措施,发挥中国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价值,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供中国的文化智慧与文化方案。

该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出发,发挥我国文化理论和文化战略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属性,科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目标,全面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条件。在这个基础上,提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战略条件,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供中国的文化智慧与文化方案。

书中提出的我国文化战略主体内容,包括自主开放的文化外交战略、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战略、全球文化治理战略、世界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战略、对外文化话语权战略、对外文化开放战略、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等。这些战略既具有理论高度,又具有可操作性,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战略的整体体系,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,提供了战略指导。

《全球化进程中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研究》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,而且也为全球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,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共识,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,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。

未来,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,进一步深化文化交流互鉴,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融合,进一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。同时,我们也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文化战略和实施路径,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形势,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,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。

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)

# 故宫珍宝的第一次国际亮相

程 鹏



▲展厅现场照片



▲《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》,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

◀中国参展文物由英国“萨福克”号军舰押运赴英,图为中英双方工作人员在军舰上的合影

如果你是一个文博爱好者,如果你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,无论身处北平、天津还是上海、南京——在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,报纸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佳渠道——你会在1934年9月22日的《大公报》上读到这样一则新闻:《中英学术界发起大规模学术艺展 定明年十一月间在英举行行政院设委员会筹备一切》。筹备委员的名单中,除了外交部、财政部、教育部等部门的官员,还能看到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名字。这个展览必然和故宫相关。

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拨一点,看一看当时的历史大事件。1925年10月10日,故宫博物院成立。1930年,故宫博物院设立大规模专门陈列室两处:承乾宫清瓷陈列室、景仁宫铜器陈列室。添设普通陈列室七种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的东北,1933年1月日军进逼华北。1933年2月,故宫博物院开始进行文物南迁,文物分五批运往上海。战争的硝烟隐约可见,国宝南迁,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之旅,往后的故事还有很多。在故宫文物南迁启动后,一个“国宝西游”的故事也在展开——中国文物渡海出洋,第一次以主题展的方式大规模亮相西方世界。回到前段所说的那则新闻,1934年《大公报》说的“学术艺展”正是1935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“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”。

这就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婉玲在《变局与新局: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》(以下简称《变局与新局》)一书中要讲述的故事。

这次展会,中国政府共征选了1022件文物,其中故宫博物院提供了铜器、瓷器、书画等735件,古物陈列所提供的书画珍玩47件。这些都是清宫旧藏文物,两项相加,占了参展文物的四分之三强。一方面,说明以故宫藏品为代表的清宫旧藏文物既美且珍,是“本国文化及艺术史上有价值之古物或艺术品”之代言者;另一方面,正如曾经担任过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所言,“自成立博物院以来,昔之所谓秘宝笈,一夫所享有者,今已公诸国人矣”。从宫殿禁地走入大众视野中,作为中国文化之代表的故宫古物,已然揭开了神秘面纱,展现在世人眼前。

作者徐婉玲主要从事故宫博物院院史研究,“故宫文物南迁”是她一直在做的研究课题。1935年的这次国际展览会,学界习惯称其为“伦敦艺展”。

徐婉玲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考察时,还意外找到了伦

敦艺展“双骑吏”的海报,并考证出这张海报的设计者是林徽因。海报的设计元素来自汉画像砖拓片,徐婉玲更考证出具体为武梁祠画像砖拓片,而故宫博物院就藏有清拓武梁祠画像卷轴。这也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展览史上的第一件展览海报。这件事单拎出来,也是中国近代设计史上的一段佳话,更是可以再作文章的一个线索:林徽因如何接到海报设计的任务,是否还做了其他方案,武梁祠是否对林徽因其他作品产生过影响等。

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资料只是一小部分,书中还有大量来自民国时期的档案、新闻报道、照片,以及来自日记、传记、年谱等出版物中的材料。可以说,令人信服的材料构筑了本书扎实、缜密的底色,而对材料的充分整理及有效利用则显示出作者的学术功力。以第四章第一节“文物运英引发争议”为例来说,伦敦艺展筹备之初,听闻大批文物要运往英国参加展览,北平学术界一片反对之声。作者将来自《大公报》(天津版)的消息作为事实陈述,同时又根据《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》《燕京报》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中部分材料来分析众人反对的原因,再引《大公报》(天津版)《京报》中的材料总结归纳北平学术界提出的意见。最后以《大公报》(天津版)《外部周刊》《北平晨报》阐述伦敦艺展筹委会的整改措施。这一节在书中算不上重要的章节,但叙述流畅,逻辑清晰,整体看下来如同一篇情节曲折的短篇小说,细节丰富、一波三折,王力、朱自清、梁思成等学者的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。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,“事实上,北平学术界对于故宫文物出洋诸多安全问题的提醒批评,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文

物大量流失事实的反思以及对于当时国内文物保护复杂情况的忧虑”。从这一处就可以窥见作者对材料的收集、整理与运用之刻苦与圆熟。

阅读这本书,我们经常能在字里行间与文化名人相遇。例如选送哪些文物参展,伦敦艺展筹委会聘请了专家来做这些事,审定陶瓷的是郭葆昌,审定铜器的是唐兰和李济,审定书画的是邓以蛰、徐悲鸿、顾树森,后又请了叶恭绰、吴湖帆和蒋毅孙。而从古物陈列所挑选书画藏品,是吴湖帆带着助手王季迁去完成的。就王季迁个人生涯而言,参与伦敦艺展的筹备工作,使得他能跟着老师吴湖帆亲见大量清宫旧藏书画,这无疑是珍贵的机缘。谁也未曾想到,这个东吴大学法律的年轻人,日后会成为一代书画鉴定大家。在他日后过眼各类中国古代书画作品时,1935年的这段经历,不知是否会萦绕眼前。

伦敦艺展也是一次规模庞大的中西文化交流盛宴,既然是文化交流,难免有阻碍。双方各自说话,有分歧、有妥协,在不断磨合中迎来了好的结局。在书中,也多次展现了这种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分歧。如在策展理念上,中方侧重展品的文化内涵;而英方更注重展品的“帝王”属性。这大概也是西方人从他们的视角审视中国传统书画,最感兴趣的地方。在书画的选择上,英方更喜欢选择有帝王题款、印章的作品,如果是帝王的作品则更好;而中方则倾向于选择文人绘画的经典之作。吴湖帆惋惜道:“外间骨董家徒知重视乾隆御题,致失真龙往往而有,积习误人,可为一叹。”而在展品陈列上,中英双方亦有不少分歧。如对乾隆皇帝的宝座和屏风的陈列,在中方工作人员看来是不伦不类;对部分字画的陈列,没

有完全展卷等。但英方对展品陈列的考虑有自己的逻辑,例如颜色相近的陶瓷放在一起,并不局限于窑口和年代;书画展厅中放入刺绣等,并不是单一从类别上考量。在谈到书中所引用的中方工作人员礼貌而克制的抱怨文字时,会更形象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冲突所产生的激荡。尽管现在地球已经是个“村”,尽管现在中西方的交流比20世纪要频繁畅通得多,但巴别塔下,隔阂仍在。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仍需要以各种方式走出去,让交流增多,摩擦减少。

伦敦艺展展出14周,日均5000余人参观展览,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历史上也是规模空前的展览。千余件中国文物,经历11个月的漫长旅程,于1936年5月平安回到祖国。未来的日子,等待这批文物的,将是更波折的旅途。

最后,我想以书中提到的一个细节来作为文章的结束。1934年11月20日,存于上海的故宫南迁文物开始进行点收工作,原属地明晰的文物归为四类,分别以“沪、上、寓、公”四字来进行分类编排;不明确的,以“全、材、宏、伟”四字编号。这是马衡院长为存沪文物所起的编号。马衡院长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,他的任期涵盖了20世纪30—40年代时期最为艰难的岁月。同时,他也是著名的金石学家、考古学家。“寓公”出自《礼记》,原指失去了爵位或封地,寄居于他乡的王公贵族。“沪上寓公”实指清宫旧藏文物离开紫禁城,寄居于上海的事实,难免有惋惜之意;而“全材宏伟”则一扫阴霾,对故宫文物的宏富与精美满含自豪与骄傲。虽然只是一个编号取名,却也是故宫文物守护者们的心态写照。这个细节满含温度,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散发出丝丝暖意。

(作者为故宫出版社副编审)